

比较研究视域中的文学、汉学 和宗教研究

——第十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综述

Literature, Sinology, and Religion in a Horizon of
Comparative Studies: Review of the 10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张 华、李丙权

ZHANG Hua, LI Bingquan

作者简介

张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丙权，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Hua, Professo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LI Bingquan, Lectur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nghua@blcu.edu.cn; lbqwxxy@ruc.edu.cn

Abstract

From September 18-21, 2014, the 10th “The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Summer Institute was held at Yanbian University, Jilin Province. The theme of this Summer Institute w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since the meeting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1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More than twenty academics from US, UK,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meet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and discussion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areas, from translation and hermeneutics,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lassics, Biblical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ture,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meeting. Across the spectrum of papers, we can see clearly ho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in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share common research ground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Summer Institute demonstrated how inter-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a and beyond may fruitfully draw on and appropriate a comparative language and perspective.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4年9月18日至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和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协办的第十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在吉林延边大学举行。本届暑期国际研讨班同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的一个圆桌论坛:“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分论坛。来自美国、英国、香港和国内11所高校共22位学者参加了本届暑期国际研讨班。在“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这一框架之下,与会学者的讨论涉及翻译与诠释学理论、比较经学、圣经文学、西方文学、汉语神学、汉学研究和宗教研究等多个领域,并对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西方文学与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密切关系广为人知,也早已成为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宗教研究何以和比较文学并列?事实上,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其成立之初便是以“比较宗教学”的形式出现的。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曾有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意为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因为“宗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宗教现象则是具体而丰富。世界各民族各地区都有各自的宗教。要探讨宗教的本质,认识宗教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就不能不对世界上各种宗教现象以比较的方式进行科学的研究。可见,比较意识内在于宗教研究的学科的基因之中。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宗教作为文化和文明的内核,是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关键,在多元文化处境中重申宗教研究的比较意识是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对话精神的体现。

比较文学注重文本研究,通过解读经典文本中的宗教精神或者细查对经典文本的宗教式解读不仅会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也会使宗教研究更加深入。在此意义上,汉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和宗

教研究结合的很好的切入点。汉学作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本身即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具备内在的比较研究意识。汉学研究经历了传教士汉学、汉学家汉学阶段，正朝向一种多元文化处境中的新汉学发展。无论是传统的汉学研究还是新时期的中国研究，都以古代中国文化经典作为自身的基础，而经典的翻译是汉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基石。初期的汉学家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他们大量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兴趣，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传教的需要。这决定了传教士译者的诠释学视域是基督教神学，这种诠释学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决定了他们对术语的选择和对译文的处理。传教士们试图运用基督教的术语和观念解读中国经典，把中国文化纳入基督教神学的解释体系。其后的学院汉学家虽然避免表现出明显的宗教倾向，但在深层意识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的立场。然而，正是这种文化的误读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宗教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绝佳文本。西方译者用以翻译中国经典的概念势必对中国读者造成差异感和陌生感，这反而邀请、照亮并更新了我们自身传统的理解。借助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我们同时也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了西方的概念范畴，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宗教精神。在这样一种双向理解中，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原发的、动态过程。

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基督教中心”和“西方中心”的诠释学视域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解的障碍，作为一种诠释学上的“偏见”，它们恰恰提供了更丰富的诠释学可能性。故此，对西方汉学、中国经典外译、西方经典文本（如《圣经》）及其中译的研究可以开辟一个双向乃至多向的诠释学空间。而体现在其中的平等、对话和“去中心化”的立场也可在方法论上为比较文学、宗教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跨文化和比较研究需要打破一种单向的、本质主义的决定性思维，寻求平等的对话和互释。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比较文学、汉学和宗教研究相遇，这不仅大大拓展了传统的

文学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空间，也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在此视域中，圣经文学、比较经学、汉语神学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经典翻译、诠释学和汉学研究

经典文本的翻译在比较文学、汉学和宗教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翻译的理解经历了一种从“工具论”模式到“诠释学模式的发展”。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翻译及其诠释学视域问题获得了新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以《经典旅行中的加法和减法：以〈威尼斯商人〉的汉译及其选择为例》为题，从《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一场对话中的一句话“Thou art translated”入手展开讨论^①。杨慧林指出，此处的“翻译”（translated）意涵在中文译本里已经被隐含了，却与“Thou art changed”一并被表达为“变了样儿”或者“换了一个样儿”。“translated”一词从“翻译”到“换了一个样儿”，被涂抹或者模糊的还只是词语本身的隐含义；如果推及作品背后的文化隐含义，这种下意识的涂抹和模糊则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一部作品在不同语境中的改写和接受，往往由此而来。杨慧林进一步指出，反过来看，如果针对“文化无意识”和“前理解”的顽强张力，在译介活动中充分“还原”那些“不可化约的”隐含义，经典的旅行又可能为异域文化添加新的意义，并且也在自己的语境中进一步强化这一意义。随后，杨慧林以《威尼斯商人》为典型案例，结合不同的中文译本，就作品之“意义”文本和语境化的“翻译”、“还原”以及“延异”的状况，进行了详尽分析和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李丙权博士的论文《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诠释学视域》则以西方世界对《论语》的英译为例，探讨了经典

^① 原文如下：“O Bottom, thou art changed! What do I see on thee? What do you see? You see an ass-head of your own, do you? Bless thee, Bottom! Bless thee! Thou art translated.”

翻译中的诠释学视域问题。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诠释活动，具备“语言内”翻译和“语言间”翻译两种不同维度；于此相应，翻译天然具备“古今之分”和“中外之别”两种视域。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不仅指向“中国概念如何走进西方”（语言间翻译/中外视域），同样还指向“经典如何走入现代”（语言内翻译/古今视域）的问题。让经典走入现代涉及到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即我们当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来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何为西方、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细心分辨其后隐含的古代和现代性视域，把对现代性的反思渗透到对中外文化传统的思考之中，在某种共性的基础上审视所有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子淳博士对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从现象学、诠释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其论文《不同世界的文本可能比较吗？——兼论一个圣经互文案例》处理的是一个有关进行比较文学的底层理论问题。这一学科在今天虽然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可是对于从人文学术的理论探究者来说，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境域等等背景元素的文学作品可以作比较，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基础性议题。林子淳不仅从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传统检视了这个问题，还从宗教学角度提出了一个具体案例——圣经的互文——作为说明。

对经典翻译和诠释学研究的兴趣与近年来中国学界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兴趣相伴而生。在对早期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中蕴含着丰富的比较文学和宗教研究资源。上海师范大学讲师丁大刚的发言《儒耶对话之道：从理雅各英译孟子“性善”谈起》认为，理雅各对孟子性善论的译、注、评涉及经学诠释学、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知识，因此，分析理雅各英译本《孟子》中对“性善”的理解，需要结合理雅各的翻译思想和宗教哲学背景，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阐释。他的发言针对理雅各英译本《孟子》几个篇章中对性善的翻译和注释，以及绪论和其他著述中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进行了跨

文化解读。

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她的论文《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了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通过这些原始资料的研究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山东师范大学李海英副教授也以《日本明治刻本〈大清文典〉的学术价值》为题进行了发言。论证了由美国来华传教士高第丕和中国知识分子张儒珍合著的《文学书官话》在海外的影响及其在汉语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比较经学和圣经文学

对中国经典外译的关注在方法论上部分地受到西方学界“经文辨读”运动的影响，甚至冠以经文辨读之名。在经文辨读理念影响下，比较经学研究近年在汉语学术界逐渐兴起。其提倡者和代表人物当属中央民族大学的游斌教授。在这次研讨班中，游斌教授以《论比较经学作为汉语基督教经学的展开途径：兼以朱子之读经法为例》为题，针对在汉语学术界中开展的圣经研究必须要面对的“多元经典”处境，提出以“比较经学”作为汉语基督教经学研究的可能途径。他说，通过对圣经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多元宗教、多元经典之间的比较经学实际上一直构成圣经研究的潜在方法。而所谓“文本辨读”与“经典辨读”，其方法上的假设、理念及操作方式，也可视为一种比较经学的前身。游斌认为，在圣经研究的学术史基础上，借鉴“经典辨读”或“跨文本诠释”等当代圣经诠释理论，尝试对比较经学做出一个定义，并对它可能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

是必要和可行的。针对汉语语境下的圣经研究的特殊处境，他说，比较经学可谓是一种介于比较宗教学与神学之间的圣经诠释方法，具有与当代比较神学类似的性质。与此同时，游斌以儒家朱熹的读经法为例进行了一个比较经学的实践，分析了朱熹对于“何为经”、“为何读经”、“如何读经”的解答，并以此反观朱子经学对于汉语基督教经学的可能意义。

浙江大学梁慧副教授在其题为《对话的诠释学：比较经传学视域中的中西经典阐释》的论文中，从比较经传学的视域出发，探讨了在本土多元化的经学传统处境下，如何建构以“对话的诠释”为重心的跨（宗教）经典诠释方法论，为汉语圣经解经实践提供一种开放的、动态的诠释模式的问题。梁慧指出，这种构想是基于对中西古代经典解释传统的考察，尤其是古代犹太释经传统和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辩读”与比较而产生的。论文主要选取古代犹太拉比解经学与孟子“知人论世”的尚友法，检视各自所蕴含的“对话”诠释特质。梁慧的论文以上述两者的诠释特征和旨趣为比较的参照，认为“对话的诠释”将是多元经典诠释传统中的汉语圣经诠释学可以汲取的经学资源，从这两大中西古典释经源流传递下来的强烈的实践倾向，也将使汉语基督教经学继续呈现诠释者与上帝、古今之善士持续的对话与分享，并在跨宗教的视野中深入建构本土圣经诠释模式。

复旦大学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教授的论文《比较经典与比较神学：从明清汉学到当代宗教对话》指出，耶稣会士和中国文人经典的比较阅读在形塑汉学的方式、焦点以及传播途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者之经典的阅读，需要付诸接受预设性前提和挑战的努力，而每一方逐步建立起新的诠释原则也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考察他者对你方经典的阅读和理解，也是双方诠释自身知识整个进程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当代文化对话语境下发展中的汉学，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亟待解答的问题。魏明德教授尝试

通过叙述中西方在经典诠释与交流方面的一些为学术界熟知的事实，来建立一种比较的诠释方法，并将这一方法集中运用在“比较神学”的研究上，并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尝试，来研究汉学、比较经学以及诠释学在当代文化对话中遇到的问题。

除比较经学之外，传统的圣经文学研究仍然是研讨班的传统主题之一。河南大学梁工教授在题目为《多元化圣经文学批评的当代景观》的发言中，阐述了圣经的多重性质。他说，圣经既是古代犹太民族和早起基督教的神学典籍，又是其史学典籍和文学典籍，而且这三重品质引导了理解和阐释圣经的三条路径。在圣经学术史上，这三条研究路径既错综交织，又各有其辉煌和繁盛之时。梁工教授认为，当代圣经批评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元文论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全面拓展和有力深化。

中国人民大学张靖博士的论文《对抗暴力的智慧：〈箴言〉1-9章中的“外女”形象分析》立足文本，从词源和翻译入手追究意义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建构和权力空间。张靖注意到《箴言》1-9章中的“外来女性”或“陌生女人”形象与另外一位女性“智慧妇人”或“贞德妇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已成为不道德女性的代名词。但深究“外来女性”或“陌生女人”的希伯来词源意义及衍变、《箴言》1-9章形成时期的文化思想背景以及《希伯来圣经》其他各卷中的女性故事（如他玛和路得），张靖认为此类二元对立式的标签是一种人为建构，对当时和现在的女性都是一种语言暴力，而重新解读这一形象能够帮助女性发掘内在的力量和智慧，反抗千百年来通过各种途径强加于她们身上的束缚和暴力。

三、宗教研究与汉语神学

在汉语学术处境中，无论是比较经学还是圣经文学研究都不具备强烈的认信性色彩，更多是以“信仰中立”学术研究为立足点，

这与宗教研究的学术定位相符。即便是以神学运动自命的汉语神学，也坚持学术性、非教会性、非宗派性的立场。这使得汉语神学和以基督教为对象的宗教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有很多交叠之处，非认信性的基督教研究甚至被纳入广泛意义上的汉语神学的范畴之中。作为汉语神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在本届研讨班上做了题为《从宗教改革到宗教战争》的发言。他认为，16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既是一次宗教事件，也是一次政治事件。路德和卡尔文的主张涉及的都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问题，仅仅把宗教改革事件限定在路德和卡尔文身上也未免过于狭窄。因此，必须把随后的一系列事件纳入宗教改革事件的范围，从一个更大的历史时段视角来理解宗教改革，注意到宗教改革在欧洲不同政治单位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法兰西王国、英格兰王国、西班牙王国和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改革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西方宗教改革的结果是基督教世界被分解为多个信仰不同教义的共同体，每个教会都宣称其代表真正的信仰，多元教会取代了统一教会。教会的改革直接导致的绝非仅仅是教会的分裂，也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给基督教的欧洲带来了长达多个世纪的政治纷争。他认为，统治权威——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只有在基督教的奥体中才具有超凡魅力的地位，一旦教会需要服从世俗权威及其国家理由，就需要从自然中寻找社会秩序的原则，自然秩序的原则就会取代精神秩序的原则。宗教改革导致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自然状态、人民主权、国家理由逐渐变成了这些世俗和自然原则中最有力的概念，替代传统的基督教信义充当政治秩序的基础。宗教改革表明，欧洲传统的智识和精神秩序已然崩溃，新的智识秩序尚未出现。路德教义的传播开启了西方文明史的一个争论不休、动乱迭起、党见泛滥的新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以《倾听的艺术与祈祷的现象学》为题，在本届研讨班上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倾

听”长久以来就属于一个神学概念。宗教的生活和神学的基础就是上帝的言说和人对于上帝的倾听。耿幼壮教授着重介绍了法国哲学家克里田关于倾听的现象学思想。作为倾听概念最积极阐发者和运用者,克里田从不同角度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运用现象学方法分析宗教经验的可能性,而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倾听。不仅如此,作为一位神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克里田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宗教体验、神学理论与审美经验、艺术分析融合在一起。不仅诸多艺术品成为其倾听的对象,而且其作品本身就展示了一种倾听的艺术。这一倾听的艺术的最好例证之一就是祈祷这一宗教现象。克里田关于祈祷现象的分析“出色地说明了一种宗教体验的肉身现象学如何可以自海德格尔将语言基于召唤-回应结构之上的最初设想中发展出来”。从而在作为特殊宗教经验的召唤与回应结构和作为普遍认识论活动的问题与回答结构之间建立起一条桥梁或通道。沿着这条桥梁或通道,神学启示与文学活动之间的联系或许也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探讨。

以上两位学者的发言充分体现了汉语学界神学研究的人文学进路。通过对汉语学界基督教研究和汉语神学研究现状的分析,美国耶鲁大学著名青年汉学家司马懿(Chloë Starr)博士在本届暑期班上展示了她的最新研究成果《杨慧林与意义的探寻》。她指出,当代中国非教会背景大学里的基督宗教研究,特别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对形塑“中国精神”的影响已明显超过任何中国教会神学院,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研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远超某些宗教实践。如此说来,对学术性或者经院式的基督宗教研究是否属于真正“神学”的争论,实质上是可否有以及如何进行“非宗教的基督宗教诠释”问题。司马懿博士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在进行意义的探寻过程中,为研究和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纪建勋博士以《汉语神学的滥觞:利玛窦的

“帝天说”与上帝存在的证明》为题，尝试对“帝天说”展开另一视角的研讨，认为其不仅是一种本地化策略的使用及处境神学下的发明，更是一种浸润在经学与神学两大诠释传统下的“上帝存在证明”。在利玛窦看来，中国古人对上帝的正确认识来源于“自然法”，其本质是运用自然神学与历史框架来构建明末的上帝论。惟“帝天说”能够推证西方的天主与东方的上帝是文明本根处“同体异构”的概念，可以从心理及社会效应层面帮助儒家基督徒由儒入耶，并最终达致儒耶交融的理想境界。此种视域下的“帝天说”可谓汉语神学的滥觞，而不应仅将其片面化处理成译名上的论争。

来自英国威尔士大学的那奥米（Naomi Thurston）博士也以汉语神学为题，提交论文《〈智者纳丹〉：汉语神学话语和宗教研究中的宽容原则与关于宽容的原则》。这篇论文主要讨论了最近十年汉语神学和中国学术界的宗教研究问题，并援引莱辛的文学作品《智者纳丹》（*Nathan the Wise*）中关于宽容的描述，提出“神学”定义的多种可能性，并就此探讨了“神学”既有的所谓定义是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话语的“绊脚石”的问题。

四、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

自2008年开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宗教研究设为大会的分论坛之一，强调宗教研究的比较特质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联。比较文学这一跨文化研究中出现了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尤其体现在其与宗教和文化研究的结合之上。在文本分析之外，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注重超验的精神维度。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在其论文《生态批评理论的宗教始点》中提到，生态批评理论在提出之初就具有宗教背景和内涵。生态批评由最初立足于文学批评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这个始点，向更为深层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思想批评和政治批评为主导路向的演进，恰如生态学以

自然科学研究为始点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演进一样,表达了人类渴望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寻找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并进而进行精神疗救的吁求。生态批评的产生既有生态危机的外在现实背景,也有表现为现代性危机的内在思想背景。生态批评产生的外在背景因其可感性而较为容易把握,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生态批评的表面化、形式化理解;生态批评产生的内在背景具有思辨性和哲学特征,它引导了生态批评当代发展方向,即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思想批评和政治批评的内涵和走向。

中央民族大学宋旭红教授的发言同样强调文学与宗教研究的关联。其论文《乔纳森·爱德华兹中国接受史:在文学与宗教之间》以美国本土神学家、作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为研究内容,介绍了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宗教观和艺术思想。乔纳森·爱德华兹是北美殖民地时期“大觉醒”运动的领导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本土神学家,对美国精神史和文学史的影响均十分深远。中国学界对爱德华兹的接受以文学领域为主,宗教方面的研究则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才渐次彰显。位于文学与宗教之间的这种爱德华兹接受落差反映出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领域起到重要作用的若干潜在原则,如源文化的优先性、意识形态优先性等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汪海博士的论文《通过布朗肖重释“无为”的激进性》显示了鲜明的比较研究意识,为我们打开了如何通过法国文学家、思想家布朗肖的理论重释老庄思想之门。汪海认为,“无为”或许是老庄思想中最大的悖论之一,通常的解决办法一是将对“无为”的理解置换为对“自然”的理解;二是尽量避免将“无为”与不行动、柔弱、无力、退隐、被动等“负面”概念群相联系,用大一统的辩证法将“无为”解释为“有为”(儒家)的增补。这些解释策略忽视了道家思想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激进性,比如它对儒家的根本性批判;也限制了道家思想面对现代生活时的解释力和批判力。而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法国文学家、思想家布朗肖对“被动性”

和“弱”的重新解读，或许会为我们重现发现“无为”的激进性提供了一条有益的进路。

苏州大学徐文博士通过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学人文思想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儒学人文主义其实是十九世纪“美国文艺复兴”思潮的思想来源之一的看法。其《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对中国儒学人文思想的阐释与再建》一文认为，爱默生对中国儒学思想的阐释和再建与欧洲启蒙主义者有所不同，特别表现为《四书》《五经》等宋明理学家选本在美国的译介与本土化阐释，宋明理学与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之间形成了理论观念的再建。爱默生的“超灵”学说与理学家的“理”和“气”并非偶然地构成一种认识论的同一性，爱默生的“心境”观念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具备了从结构模式到核心观念之间的多元对话。徐文的论文还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研究美国人文主义来源的新观念，其历史文本考证法与辩证理性批评均表明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变革副教授通过其论文《僭越与盲目的虚无图景——〈群魔〉中的虚无主义群像》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表现的虚无主义精神。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张变革归纳了虚无主义群像的类型，阐释了其精神特质。如果把虚无主义精神引入到终极追求，就形成了人神学说——以自己代替上帝的虚假学说。僭越是对傲慢极限的挑战，也是虚无主义最深层的精神特质。在剖析这些负面精神现象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勾勒出了人走出虚无的精神图景，即以宽恕和怜悯的爱重建人的心灵秩序。

本届暑期国际研讨班加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再一次突出了“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特征，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丰富了宗教研究的方法。显示了“神学和人文学”这一研究进路在多元文化处境中强大的学术激发力量。